

# 张凤芝其人

□詹超音

小凤芝爱唱歌，是天性。大兴安岭很安静，一只松鼠拖着大长尾在樟子松的树干上支直了身子；汨汨的黑龙江水打着旋儿，几只鱼鹰 晃 在 水 面 ， 好 久 没 动 。 …… 歌 声 太 好 听 了 ！

张奎发听人说关东好，具体哪个地好，并不知道。因为不明前程，就成了闯。这跟满清时期的闯两码事，没人拦。相同的是一路往北，哪儿能生存就在哪歇脚。

大草甸子，大兴安岭深处的一块平地，傍黑龙江。能走到此地的人不多，有地可耕，有木可采，听说这一片山沟还能淘到金子。“五行”天作，可以栖居的地方，没有比这更好的去处。

关里的习俗，媳妇只管生孩，养家是男人的天职。张奎发的娘们连生仁丫头，凤珍、凤荣、凤芝。山里头出了凤凰，高兴的是小伙。姑娘面前，小伙子将马鞭子甩得噼啪响，放大声吆喝畜牲：“得！——得！——得！——”他们认为——这招管用。东北的男人必须出色，女人不会嫁懒汉。

“樟子松不分雌与雄，骡马照样能驾辕……”

张奎发知道，又是哪个小伙嘴跑调，小女儿凤芝用歌怼他们。三个女儿各差一

两岁、两三岁，两个大的文静；小女儿芍药花一般白净，杜鹃一样奔放，声音如铃。小伙子存心找茬，就为听那银铃般的声音。

没人时，凤芝也会哼给自己听：

“樟子松高吐，杜鹃仰头望；马儿壮吐，上了山，拉来木头盖了屋，一堆娃娃炕上跑……”

丫头有脑子，唱唱而已。这儿只有小学，凤芝想早点到山外上中学，好知道山外究竟是啥样。

大草甸子改了名：北红。凤芝喜欢这个名字，北红会红。

刚懂事那年，北红突然来了两百多个上海知青，与这儿的小伙不同，他们特乐观，但也时常哭。凤芝觉得哭哭笑笑的人很有意思。这些叔叔辈分的人身子骨都偏小，但能说会道，讲的尽是闻所未闻的山外事，说上海的楼有二十四层高，说他们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才到的这儿，坐晕了……天地真大，山外真奇。

“飞龙只在林中，江水流向何方。凤凰能飞多远，我想远飞。”

小凤芝有了心思，她在想象城市的模样，想去城市。村里有几个姐妹看上了

上海的小叔叔，凤芝没去凑，她想自己闯出去，不图谁带她出这个山。事实证明凤芝是对的，知青们之后一个个都返了城，北红又归冷清。她认准了一个干活胜过说话的男人，嫁了，一起跑到了大兴安岭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，打拼正式开始。三十年里，凤芝做裁缝，卖蔬果，而后办企业做起了醇基燃料生意。

“高高的兴安岭，一片大森林，森林里住着勇敢的张凤芝……”

张凤芝仍然爱唱歌，在歌声中事业有了成了。如今她已是大兴安岭、加格达奇两级工商联执委，政协委员，非公有制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。成就感最大的是女儿上了大学，儿子获得了博士学位。前年，她拿了打拼得来的钱回到了北红山村，带领大家广办民宿。北红已经红了，民宿火爆。

“欢迎你来我家乡最北的边疆，原始森林的模样冰雪的天堂，盘腿坐在小火炕儿饭桌摆中央，烫上一壶小烧酒儿酸菜炖血肠。”

高尔基说：“民歌总是亲切地伴着历史，它们有自己的意见。”

张凤芝的意见：一起脱贫。

# 凸显小说的厚重感

——读倪辉祥的小说《奇恋蕴真情》

□何国胜

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是要讲好故事。故事讲得精彩，自然更能赢得读者的青睐。

倪辉祥写了好多年的小说，也讲了不少故事。在我的眼里，他善于写情感类故事，描写男女间的情感，多样且丰富，既探索人性，也反映社会风貌。

前些天读了他《奇恋蕴真情》小说，从书名我就猜想到，这也是描写男女间情感的小说。书名中的“奇恋”，表明了他讲的是非同寻常的恋情。倪辉祥也没有摆弄玄虚，在小说的“引子”中就作了交代：“朋友妻，不可欺；若要欺待到朋友死。偶有胆大妄为者，则会被不齿的村邻居的唾沫给淹死！”民风民俗，以及村民的淳朴，自然不容这样的大逆不道者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里，民风民俗里也存在着不合适时代发展的步伐。譬如，当朋友妻成为了单身，她是否可以接受朋友的爱情。倪辉祥就创作小说，来阐述他的思想。

《奇恋蕴真情》描写的是滕新君和郎小舟两位亲如兄弟的朋友，他们先后也结了婚。不过，他俩的婚姻都不是由双方相爱结合的。后来，滕新君的妻子生病去世，郎小舟意外又溺水离开人世，留下的滕新君和郎小舟的妻子张莲香，他们在相爱中组成了家庭。这是小说全部的内容。小说的焦点，就在于滕新君和张莲香走在一起，张莲香是朋友妻的身份。尽管双方的配偶已不在了，但与当地的民风民俗还是相悖的。好在他们是幸运的，这时他们已处在祖国的改革开放，当时我国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。同时，精神层面文化生活也走进了新时代。他们重新组建家庭，不但没有受到村里的流言蜚语，还得到了郎小舟父母的认可和接纳。

单从整个故事来看，内容是简单的，情节也平淡。不过，小说依然具备了可看性。因为小说在人物的塑造，以及场景的描绘都逼真生动，且包容了社会时代特征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国的农村还处在农耕生活，一户家庭日子过得好不好，勤劳是一个因素；还有一个因素，江南村落人多田少很普遍的。因此，家庭人口多少，也直接影响了生活的质量。滕新君兄妹多，在农村属于贫困人家。好在滕新君颜值高，他被村长的独生女儿相中，他又被安排到公社电站学习。这对滕新君，包括滕新君的家人，是遇到了时来运转时刻。在农村，村干部的家境相对属于好的。何况村长，他家只有一个女儿。可滕

新君对这装婚事不乐意，原因也简单，就是村长女儿长得难看。男女要相爱，外表往往是第一感触。可滕新君最终，还是接受这场婚姻。因为他入赘女方，他的父母弟妹生活可以过得好一些。父母也利用他的婚姻，可以高攀村长这样地位的亲家。

孝是传统文化的核心，尤其在农村，三代、四代同堂生活的普遍。孝便是维持大家庭安宁的重要纽带。也因为孝，延伸了血缘的亲情，满足了几孙满堂的习俗幸福感。另外，从农耕经济来说，分灶过日子的开支就会更大。

《奇恋蕴真情》的故事内容的确简单。但小说的人物塑造，生活场景的描写，是很能呈现时代的风俗特征。滕新君在电站工作，很快当上班长，这不是他有心计，或者已有善于经营自己的意识。而是他面对不幸的婚姻，把自己的精力全用在了工作上。当然，滕新君也是个有工作能力的人。在后来担当了电站站长的岗位，他同样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他的亲如兄弟的朋友郎小舟，就是仰仗他的情意，娶到小美女张莲香。应该说，这部小说很注重细节描绘的真实。场景、人物形象刻画的鲜活生动，都彰显了这部小说内在的力度。

婚姻，不同时代都存在背离真心的爱情。因为，婚姻也是社会的产物。小说中的郎小舟与张莲香成婚，张莲香也是不喜欢郎小舟的，也是在她父母催逼之下。张莲香的父母之所以要女儿嫁给郎小舟，其原因，还在于郎小舟在电站工作。当时的电站工作，虽然不属于吃商品粮的国营企业，但比较起农村的农民拿工分，电站工作还是要强得多。电站工作的益处，张莲香父母在翻建房子中已得到过实惠。从这个角度分析，滕新君的父母也好，张莲香的父母也好，他们都注重于生活的实际。子女的婚事，也理应由父母做主。因为，他们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。

由此可见，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两个婚姻家庭，折射出的是当时的社会风貌，包括婚姻的习俗。现在再来看滕新君与张莲香能走到一起，且没有受到习俗的阻力，恰好是体现改革开放，不仅让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。而且，人们的思维活动也从凝固中走出来了，这是现代文明冲击着不适合的民风。倪辉祥的这部小说，就是巧妙地把人物融入于的社会大背景之中，凸显了小说的厚重感。小说其内涵，也更为深远。

# 他心里始终装着人民(二)

——怀念老领导杜述古同志

□马仁俊

(上接8月16日8版)  
2.不能让“鱼米之乡”的种粮农民吃不饱肚子

松江历来是个重点产粮县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，征购任务一直很重。据1978年后长期在县粮食局负责计划和农村粮食购销工作、后来曾任副县(区)长的山兆辉回忆，尽管1978、1979年松江连续两年丰收，1979年松江粮食总产量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，但仍面临粮食安排紧张的矛盾，农民口粮水平较低，一些缺粮队全年人均口粮仅为240公斤原粮；农村留用的饲料粮也不能满足养猪生产发展的需要，猪肉供应紧张。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口粮中一度每月只有1公斤粳米，其余的则是松江人不喜欢、不习惯食用的籼米、面粉。问题的症结，主要是粮食征购基数过高，粳米调市任务过重。

杜述古同志认为，在素有“鱼米之乡”之称的松江，竟有种粮农民吃不饱肚子，城镇居民吃不到

粳米，那是有负于松江人民的！1979年2月，松江县委向市委要求调减粮食征购基数，从10.7万吨调减到9.8万吨。当年11月底，山兆辉随杜述古同志去市里参加粮食工作会议。会议期间，在市委召开的有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旁听的县委书记会议上，杜述古同志率先发言，要求市里确认松江提出的调减征购基数。唯因当时全市粮食“盘子”缺口较大，一时无法同意松江的要求。但他的发言已在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。

据山兆辉回忆，陈云同志当年曾在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指出：“在三五年内，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增加2000万吨”，“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”。1979年，中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，国务院安排上海继续增加粮食进口量，增幅高达74.4%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“考虑到郊区耕地面积减少和减轻农民负担”，市委决定1980年起调整粮食征购基数，平均调减12.5%。市下达给松江的粮食

征购基数为8万吨，调减幅度达25%。这是从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，本县粮食征购基数的最低水平。此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，也有力地支持了种植业结构的调整。1980年，松江继续扩种棉花4万亩，棉花种植面积增至12.6万亩。同时，扩种西瓜5000亩，蔬菜400亩。当年全县实际交售粮食下降到6.5万吨，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，提高了农村的留粮水平，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口粮中的粳米数量也随之增加。

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，松江鱼、虾等传统水产品供应紧张。为了改变这一局面，改善市场供应，1984年，县委、县政府发动各公社于秋收后开挖万亩鱼塘，当年新辟养鱼塘8000亩，并初步建成生产配套体系。据《松江县志》记载：至1985年，共挖建成鱼塘730只，水面达6221.17亩、挖建鱼种塘760只，水面为2258.42亩；当年养殖产量达到4040吨，比1978年的543吨增长

了将近6.4倍。一举解决了“鱼米之乡”人民“食无鱼”的难题。

3.要想办法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

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着一句口号，叫做“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富，无商不活”。

杜述古同志长期从事农村工作，和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，深知农民如果只是在“一亩三分地”上营生，是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的，必须带领他们走上一条能够较快地富裕起来的道路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县委、县政府和各乡镇(公社)像重视抓农业一样抓工业，乡镇(社队)企业有了较快发展。据《松江县志》记载，杜述古同志主政松江期间(1977—1985，下同)，乡镇(社队)企业工业总产值由9786.9万元增加到63561.0万元，增长了5.5倍；利润总额由2447.7万元增加到8503.0万元，增长了2.47倍；务工人员由36870人增加到99669人，增加了1.7倍。10万农民组成了一支“离

土不离乡”的务工大军(几乎户都有一人务工)，使农民家庭收入快速增加，加快了由贫困、温饱向小康、富裕的转变，乡镇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！

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县委、县政府和各乡镇(公社)积极扶持农村家庭副业。农村家庭副业在“文革”期间被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而几乎被全部割掉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禁区一旦打开、束缚一旦解除，广大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立即迸发出来，他们充分利用剩余劳动时间、剩余资金、剩余房舍和自留地及诸如宅边、河边、沟边、路边等“十边”地，经营“庭院经济”，发展家庭副业，使农副产品和农民家庭收入快速增加。涌现了以新桥公社杨四海、余山公社周阿四等为代表的依靠家庭副业发家致富的首批“万元户”。

乡镇(社队)企业的崛起和推进以“三改两”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耕作制度改革、调整农业经济结构、发展农村家庭副业、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(包产到户)、划小公社规模(全县公社数量由13个增加到19个)、创建“文明村”等，汇合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松江农业农村改革的第一波浪潮。



□刘 晓